

# 在蘇維埃政權的四十年中 家畜流行病學的成就

阿·依·烏連捷耶夫

俄羅斯的工人階級和愛好勞動的農民結成同盟在以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領袖 B. I. 列寧同志為首的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地主、資本家的統治、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裏、並在世界上第一個創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自從這一有歷史意義的日子以後，已經四十個年頭過去了。在這四十年中蘇聯已經從一個經濟上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一個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變成一個擁有先進科學、文化和技術的國家。蘇聯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儘管處於難以令人置信的困難條件之中，仍然建成了社會主義，完成了文化革命，今天，他們正在勝利地開闢着通往共產主義的道路。

在這段時期中，獸醫學、其中包括獸醫學中最重要的學科——家畜流行病學——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在蘇維埃政權的四十年中在研究和防止傳染病方面所完成的工作，比起舊俄時代在一百多年間所做的工作還要多很多倍。

沙皇政府在獸醫方面遺留給蘇維埃國家的只是一個困難重重的局面，在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的年代裏，國內的家畜流行病狀況更為惡劣，沙皇俄國沒有任何時候能够加以擺脫的許多危險性極大的動物傳染病（牛瘟、牛傳染性胸膜肺炎、炭疽、馬鼻疽、綿羊痘、口蹄疫等），得到了大規模的散播。十九世紀末葉在俄羅斯的歐洲部分已經消滅了的牛瘟，於1918年又從外高加索突圍而出，且沿着北高加索、烏克蘭、別洛露西亞以及中央各省一帶進行散播，傳染性胸膜肺炎、口蹄疫、炭疽、豬瘟、豬丹毒、綿羊痘、馬鼻疽等幾乎猖獗地席捲整個國家。上述這些疾病使國民經濟特別是對畜牧業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加深了勞動農民原已嚴重的困難局面。例如，從1917年到1922年中僅是由於牛瘟一病就損失了一百多萬頭牛隻，馬匹死亡於鼻疽者數以千計。

1921年 B. I. 列寧同志在說明動物流行病對於國民經濟以及對蘇維埃共和國人們的衛生狀況的損害時這樣寫道：“動物流行病破壞着共和國的經濟狀況，加深了農業危急，打亂了一切畜產品原料的收購計劃……此外，也危害着勞動者的健康。動物流行病——這乃是社會、政治、經濟上的敵人”。

由於考慮到這種情況，共產黨和蘇聯政府還在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早期就已經採取了堅決的措施，以便消滅這些流行病。例如，早在1918年初就頒佈了一道由列寧同志簽署的關於建立國立實驗獸醫學研究所的法令；1919年一月十八日頒發了列寧簽署的“關於動員獸醫工作者防止動物流行病”法令；1919年九月十一日頒佈了“關於在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境內停止和預防牛瘟的措施”的法令，在這個法令中制定了具體的消滅牛瘟的方法。同年又頒佈了一項“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防止農畜傳染病所需之接種材

料的供應辦法”的法令。1920年十一月十二日頒發了由B.I.列寧簽署的防止鼻疽的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的決議，決議上規定了徵收和屠宰鼻疽病畜（馬、驢、騾）的辦法（有給畜主支付報酬的），也頒發了其他各種旨在改善國內獸醫事業以及消滅流行病的法令和指令。這些法令不僅促使了順利地消滅了那些國內特別危險的傳染病，同時也迅速地發展了家畜流行病學以及促進了獸醫生物製品工業的成長。

1923年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人民委員會通過了通行於全國獸醫界的全國性法律——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獸醫法，這乃是一件具有着發展獸醫學的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這個歷史文件在加強蘇聯獸醫科學以及改善國家的獸醫事業中起了重大作用。此外還大規模地動員了獸醫專家們起來與動物流行病進行鬥爭。

1936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決議通過了一個新的蘇聯獸醫法規，這個法規在發展動物流行病學這門科學中、以及在蘇聯消滅動物的各別一些傳染病方面也起了積極的作用。於1951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批准了另一個蘇聯獸醫法規，這個法規一直到现在仍然有效。所以要頒佈此法規是因為從第一個蘇聯獸醫法規頒佈至此在這15年的期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牲畜頭數顯著地增加，湧現出很多大型的集體農莊，科學研究機關提出了新而且有效的預防家畜傳染病的辦法，根據所有這些情況有必要重新修改蘇聯的獸醫法規。

蘇維埃政權建立了獸醫事業，其中也包括在完全新的原則上來防止動物流行病，即：防疫措施的計劃性、綜合性，作為防止動物傳染病之基礎的預防性，地域的統一性（協調性）、執行防疫措施以預防和消滅動物傳染病時之廣大農民羣衆參與的積極性等等。

由於蘇維埃國家採取了防止動物流行病的堅決措施以及獸醫工作者的忘我勞動，早在1923年在蘇聯的歐洲部分就已經消滅了牛瘟，到1928年末在外高加索也消滅了牛瘟，從1928年起蘇聯已經擺脫了這個危險的傳染病的爲害。

在消滅牛瘟方面C.H.維舍列斯基、A.B.捷丘林、C.II.德拉琴斯基等學者起了特別重大的作用。

1933年B.Ф.阿列克謝也夫製備了抗牛瘟福爾馬林組織疫苗和甲苯疫苗，1949年П.М.巴孜列夫和С.Г.阿爾吉安尼提出了更爲完善的製劑——福爾馬林氫氧化鋁疫苗。

1934年初在全國範圍內消滅了牛傳染性胸膜肺炎，在消滅這個傳染病中C.H.維舍列斯基И.П.杰爾別杰諾夫、Я.Е.柯梁柯夫、А.Н.馬卡列夫斯基、Д.С.魯仁采夫、М.Г.塔爾塔柯夫斯基等人作了許多工作，他們全面地研究了病原體的生物學特性、流行病學、病理發生、臨床症狀、病理解剖學以及診斷學。

1933年Я.Е.柯梁柯夫和卡嘉葉娃爲大規模地進行牛傳染性胸膜肺炎的診斷提出了更爲簡便而廉價的診斷方法——團集反應。

C.H.維舍列斯基和布奇涅夫於1932年證明了可以用九一四治癒病牛、特別在疾病的急性階段治療效果更好。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也已經消滅了馬鼻疽。在消滅這個危險的傳染病中C.H.維舍列斯基、Д.С.魯仁采夫、Н.Е.茨韋特柯夫等人有着巨大的貢獻；1918年Д.С.魯仁采夫提出了在蘇聯軍隊中防止馬鼻疽的方案，1922年C.H.維舍列斯基製訂了更爲完善的防止國內馬鼻疽的方案。

獸醫工作者和專家們關於使我們的祖國從那些危險的流行病中解脫出來的這種宿願，隨着牛瘟、牛傳染性胸膜肺炎、馬鼻疽的消滅而得到了實現。

在這個篇幅不大的報告裏，我不可能詳盡地來敘述蘇聯的動物流行病學者們在四十年中所完成的一切成就，因此，在這裏我僅就其中在發展我國動物流行病學以及畜牧業中特別具有意義的某些問題加以敘述。

四十年來蘇聯學者們在研究和防止炭疽、氣腫疽、壞死桿菌病、破傷風、蒲氏桿菌病、結核病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在舊俄時代炭疽曾經是畜牧業的天然災難，此外，還在人們中間大量散播：根據 1912 年統計的資料，有 14935 個人患了炭疽，目前由於有計劃、綜合地採取了防疫措施，這種傳染病在蘇聯只是以散發的形式出現。C. H. 維舍列斯基、H. A. 米欣、A. A. 弗拉季米羅夫、Φ. A. 捷連奇也夫等在研究以及防制炭疽方面作了許多工作。

在 1925—1926 年間，Л. Д. 尼柯拉也夫斯基在研究馴鹿的生理狀況的基礎上查明了從三月到四月間馴鹿對錢柯夫斯基二號疫苗具有很高的敏感性，而到了五月底和六月間雖然注以大量的這種疫苗，其反應也是很輕微的。由於觀察了有機體的季節性變化、其中特別是馴鹿皮膚的季節性變化，Л. Д. 尼柯拉也夫斯基於 1927 年提出了馴鹿抗炭疽的錢可夫斯基 2 號苗一次接種法，這種方法目前仍被廣泛應用着。

1940 年 H. H. 金斯布爾格獲得了炭疽無莢膜弱毒的品系，1943 年由此品系製備成功一種新的具有良好的免疫特性的疫苗——“СТИ—1”疫苗，從 1944 年起，“СТИ” 疫苗就開始應用於抗炭疽的主動免疫注射。

1949 年 C. Г. 科列索夫用定向改變炭疽病原體的方法獲得了另外一個無莢膜的品系 III—15，1952 年科列索夫，H. A. 米哈依洛夫和 Ю. Ф. 博里索維奇製造出一種比較完善的氫氧化鋁疫苗，1956 年將此種疫苗廣泛地在實際中用來預防接種各種農畜。

1946 年 Φ. A. 捷連奇也夫和斯捷范諾娃確定了有機體疫苗注射後的反應在該傳染病的免疫發生中的重要意義。

蘇聯學者們全面地研究了氣腫疽的病原體的生物學、及其流行病學、臨床症狀、病理解剖學、診斷學等（В. И. 伊萬諾娃、Я. Р. 柯瓦連柯、和 Φ. И. 卡岡、С. Н. 穆洛姆采夫等）。

1929 年穆洛姆采夫提出了採用抗氣腫疽福爾馬林疫苗作為特異性預防。1935 年柯瓦連柯建議應用抗氣腫疽血清作為治療。

蘇聯學者茨韋特柯夫、Н. М. 斯特列勒柯夫和 A. A. 勃列烏斯於 1939 年提出了抗破傷風福爾馬林明礬抗毒素，這種抗毒素可以完全預防馬匹之破傷風疾病。

在 1940—1944 年間 A. B. 辛涅夫、Н. Г. 別連基、В. И. 扎依策夫等人擬定了以抗破傷風血清治療破傷風病馬的方法。

И. А. 杜卡洛夫、穆拉姆采夫、Р. Ф. 索索夫等在研究馬匹的肉毒中毒方面進行了有價值的工作，杜卡洛夫、А. И. 巴巴申斯基和 Д. П. 波利亞柯夫等製定了治療肉毒中毒的方法；索索夫獲得了供動物主動免疫注射用的抗肉毒中毒的抗毒素的方法。

在研究壞死桿菌病方面也進行了巨大的工作。徹底地查明了 *Bact. necrophorus* 在動物壞死桿菌病中所起的病原學的作用，研究了馴鹿（А. 博雅爾斯卡婭、С. А. 格繆涅

爾、A. K. 克拉斯諾巴也夫、穆洛姆采夫、A. A. 尼柯拉也夫斯基、A. Г. 列夫尼威赫、A. H. 切保達列夫等)、馬、牛、綿羊(П. Н. 安德列耶夫和 П. Т. 達維里斯基、柯瓦連柯、穆洛姆采夫等)的肉毒中毒的流行病學與臨床症狀。

蘇聯研究者們證明了有可能利用補體結合反應(柯梁亞柯夫、И. В. 扎合洛夫、切保列夫),變態反應(З. А. 巴拉貝爾金娜、Е. И. 郭爾布諾夫、A. Г. 列夫尼威赫、切保達列夫等)的方法作為壞死桿菌病的生前診斷。為了治療壞死桿菌病也提出了各種製劑:反病毒(柯梁柯夫和扎合洛夫),磺胺製劑(И. Л. 郭羅索夫、A. Ф. 岡恰洛夫等)以及抗生素(B. Ф. 格列津)。

在蘇維埃政府的時間裏,在研究蒲氏桿菌病方面也大規模地進行了研究工作。蘇聯學者們詳細地研究了蒲氏桿菌病的病原體生物學(維舍列斯基及其同事們、П. Ф. 茲德洛道夫斯基及其同事們、B. Е. 柯爾涅也娃、B. М. 克拉索夫、З. А. 庫切連柯、穆洛姆索夫、Е. С. 奧爾羅夫、波利亞柯夫、M. B. 列沃、Р. А. 戚昂、Д. А. 促維爾卡羅夫等),研究了各種不同動物的流行病學、臨床症狀和病程,如 M. E. 阿瓦庫莫夫、Д. К. 別斯索諾夫、維舍列斯基、B. А. 尼柯拉也夫、Г. С. 沙維里也夫、В. И. 斯道里尼柯夫、戚昂、M. K. 尤斯柯維茨等研究了牛的流行病學、臨床症狀及病程,別斯索諾夫、З. Н. 柯斯特魯林娜、奧爾羅夫、П. П. 沙莫依羅夫、И. А. 達拉索夫等研究了綿羊、山羊的流行病學、臨床症狀和病程;А. А. 斯節班諾夫、А. П. 烏蘭諾夫等對於豬、維舍列斯基、Е. А. 保貝列娃、И. В. 勃拉熱維奇、И. Е. 郭魯別夫、Б. М. 奧里夫柯夫等對於馬、П. А. 阿爾布佐夫對於駱駝、А. И. 崔洛對於禽類之蒲氏桿菌病的流行病學、臨床症狀及病程也進行了研究。勃拉熱維奇、保爾、Н. А. 納列托夫、斯節班諾夫等研究了蒲氏桿菌病的病理解剖以及組織學,阿瓦庫莫夫、別斯索諾夫、維舍列斯基、扎穆里亞、茲德洛道夫斯基、О. И. 馬利亞科娃、奧爾羅夫、薩韋利耶夫、П. А. 特利連科、茨維特柯夫、戚昂、尤斯柯維茨等研究了細菌學與血清學的診斷,А. Н. 帕什科夫斯基 1932、維舍列斯基、阿瓦庫莫夫 1934、茲德洛道夫斯基 1934、促維爾卡諾夫、克拉索夫 1948、Ф. П. 洛克切娃 1949 等研究變態反應診斷。

1955 年奧爾羅夫及其同事們在全蘇實驗獸醫研究所的蒲氏桿菌病研究室製造出兩種準備為診斷牛蒲氏桿菌病用的變應原:蒲氏桿菌浸出物 Бруцеллоэкстракт 以及由牛型蒲氏桿菌製備的微粒變應原 Корпускулярный аллерген 或 В—1 變應原。

B—1 變應原在動物機體內不引起形成抗體以及敏感性的消失。

蘇聯的學者已經獲得價值很高的預防蒲氏桿菌病的生物製劑:由 68 號品系牛型蒲氏桿菌製備的弱毒疫苗(尤斯柯維茨和 А. И. 科列索娃),由 61 號品系豬型蒲氏桿菌製備的疫苗(奧爾羅夫和 М. И. 切爾內舍娃),以及由第 3 號品系牛型蒲氏桿菌製備的疫苗(А. Я. 捷爾仁斯基),全蘇實驗獸醫研究所非活化疫苗(П. Н. 若瓦尼克),抗蒲氏桿菌病高度免疫血清(В. Г. 烏瓦羅夫 1946、戚昂 1949、К. Н. 布奇尼克 1949、尤斯柯維茨 1950)。蘇聯的學者們曾確定,在適當的飼養和管理的條件下,患蒲氏桿菌病的牲畜不經治療即可痊癒(自癒)。

蘇聯學者在研究結核病方面有着巨大的供獻。製定出防止牲畜和家禽結核病的蘇聯的一套措施,於 1 年半——兩年內其可使疫場完全健復化(維舍列斯基、П. П. 維什涅夫

斯基、B. C. 基謝列夫、尤斯柯維茨等);製定與完善了結核病的變態反應診斷方法(維舍列斯基、維什涅夫斯基、Б. И. 奧布霍斯基、Г. С. 薩韋利耶夫等);研究了各種動物結核病的流行病學,病理發生,臨床症狀,治療和診斷問題(Ф. Н. 布赫齊洛夫、維舍列斯基、維什涅夫斯基、基謝列夫、П. И. 科庫里切夫、И. И. 盧卡舍夫、А. Н. 馬卡韋依斯卡婭、В. Н. 馬特維耶夫、奧布霍斯基、薩韋利耶夫、尤斯柯維韋茨等)。

К. Г. 保爾、科庫里切夫、И. А. 納列托夫等曾在各種動物結核病的病理解剖學方面作了一些工作。

蘇聯的學者們曾對副結核性腸炎進行了許多研究,製定出在牛當中防制該病的有效措施(А. П. 阿利卡耶娃、А. И. 包羅堅諾夫、維什涅夫斯基、К. А. 多羅費耶夫, П. Г. 朴羅霍羅夫, А. Н. 斯米爾諾夫等),研究了病原體的生物學(阿里卡耶娃、維什涅夫斯基),流行病學(多羅費耶夫, Е. Г. 波索欣、Т. В. 帕碩夫、А. К. 斯特羅果夫等),各種動物的敏感性以及病程(Т. Р. 蓋努林、多羅費耶夫、帕碩夫、В. С. 里亞古左夫等),病理解剖學以及病理發生(阿里卡耶夫、包羅堅諾夫、Б. Г. 包巴申斯基、Б. Г. 伊萬諾夫等),治療方面(Т. Р. 蓋努林、А. К. 斯特羅果夫)。

維什涅夫斯基在研究牛副結核性腸炎方面進行了很有價值的工作。他第一個在蘇聯確定了牛有這個疾病(1932—1935)製備了培養病原體用的綜合培養基,提出了診斷製劑——副結核菌素 *паратуберкулин*, 製定出預防以及消滅副結核病的基礎。

蘇聯的學者們阿里卡耶夫、И. В. 朴杜布斯基、А. С. 索隆等確定了飼養不當,無機鹽類和維生素的不足以及對懷孕母馬不良的管理是構成馬副傷寒性流產發生的主要因素。根據這些資料他們製定出預防本病的一般性的措施,在這個措施中包括有特殊的一套懷孕母馬的飼養方法及其衛生的管理等。蘇聯學者 К. И. 次韋特科夫、М. Д. 波雷科斯基、И. В. 朴杜布斯基證明了應用疫苗和噬菌體作為本病的特異性預防的可能性,由於採用了這些既科學而又有根據的預防措施,於是使得在蘇聯馬副傷寒性流產這一傳染病顯著地減少。

蘇聯的學者們在口蹄疫這方面作了許多工作。研究了口蹄疫病原體的生物學,流行病學問題,臨床症狀,病理發生以及治療(Г. Ф. 邦達廉科、В. С. 扎魯勃金斯基、В. И. 金佳科夫、К. И. 朴洛特尼科夫、薩韋利耶夫、А. Л. 斯科莫羅霍夫等),研究了血清學診斷方法(В. З. 薩克瓦烈里捷、П. 薩洛維耶夫、Л. С. 拉特涅爾),主動免疫和被動免疫(В. Н. 格里巴諾夫、К. Ф. 拉米赫夫、В. И. 廉科夫、拉特涅爾、В. И. 斯維里多夫、斯科莫羅霍夫等),以及預防和消滅口蹄疫的方法(Ф. З. 阿姆菲恰特羅夫、А. Н. 巴亞基諾夫、金佳科夫、拉特涅爾、斯科莫羅霍夫等)。

在研究馬傳染性腦脊髓炎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分離出病原體——濾過性病毒並研究了該病原體的生物學特性(維舍列斯基、К. Н. 布奇涅夫 1932、Ф. И. 列溫別爾格 1932),研究了流行病學,臨床症狀,病理發生,病理解剖學,以及防治問題(阿姆菲恰特羅夫、М. Н. 維列沙金、С. М. 沃朗措夫、А. М. 維諾格拉多夫、科列索夫、柯梁柯夫、波雷科夫斯基、П. Я. 舍爾巴梯赫、В. З. 切爾尼亞克、В. И. 亞庫舍夫等);闡明了蚊和壁蠅在散播本病上所起的作用(В. В. 尼科爾斯基、И. Ф. 斯拉斯齊科夫 1934、Е. М. 耶姆楚克、Г. Х. 伊舒科威、Ф. А. 伊舒科威 1943、А. В. 瓦西里也夫 1947、П. А. 彼特里舍娃、Е.

H. 列夫科維奇1947、A. И. 穆拉托娃、Н. П. 杰多娃、П. К. 謝爾吉耶夫和 П. Я. 舒勃拉捷及其他人),研究出血清診斷方法(А. П. 左托夫、列沃和 П. Я. 什瑪里等)以及特異性的預防(帕迪科夫斯基、舍爾巴梯赫等)。

在傳染性貧血方面:分離出病原體以及研究了該病原體的生物學特性(柯梁柯夫、A. A. 皮努斯、H. A. 羅曼諾夫等),研究了診斷與鑑別診斷問題(А. М. 拉克齊奧諾夫、柯梁柯夫、波杜布斯基、С. И. 穆拉托夫、辛涅夫等),研究了吸血昆蟲在傳遞病毒上的作用(柯梁柯夫、И. М. 羅基奧諾夫、拉克齊奧諾夫等),流行病學問題(波杜布斯基、羅日科夫、穆拉托夫、羅基奧諾夫等),詳細地描述了病理解剖學以及組織變化(А. В. 阿庫洛夫、保爾、依萬諾夫、皮努斯、切爾尼亞克等)。

在蘇聯的文獻中發表了大量關於馬腺疫的科學研究工作:病原體的形態學以及生物學特性的研究(А. Я. 潘克臘托夫、А. А. 特烈齊亞科娃、И. Я. 薩多夫斯基、П. К. 波里舒克等),腺疫的流行病學和預防(潘克臘托夫、特烈齊亞科娃、В. К. 帕臘金等),研究出特異以及非特異性的治療法(薩多夫斯基、次韋特科夫、甘努什金、Д. И. 羅日諾夫、Л. П. 扎列斯基等),疫苗預防接種(甘努什金和 М. Е. 阿瓦庫莫夫、潘克臘托夫、特烈齊亞科娃、次韋特科夫等),最近 Н. Л. 斯特烈耳科夫和波里舒克製備出一種抗腺疫氫氧化鋁疫苗,此種疫苗較過去的疫苗效力好。

關於馬流行性淋巴管炎的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工作。詳細地研究了病原體的形態學以及生物學特性(А. П. 諾維科夫、К. И. 朴洛特尼科夫和 К. Ф. 拉米霍夫等),臨床症狀(П. Н. 安得烈也夫、В. М. 齊莫洛夫斯基、諾維科夫等),病理解剖以及病理發生問題(Н. А. 博羅杜林娜、朴洛特尼科夫和索索夫),治療(齊莫洛夫斯基、Н. 土蘭斯基、次韋特科夫、Я. М. 斯科爾尼亞科夫、В. Т. 科托夫、А. Н. 沙布羅夫等)。提出了許多早期診斷本病的方法:調理吞嚥反應(А. А. 斯維里多夫),補體結合反應(И. С. 阿庫洛娃),並藉助於組織胞漿菌素(А. И. 科斯科夫),囊球菌素(П. С. 塔臘紐克)以及囊球菌變應原(Б. И. 博果列波夫)。

在研究豬丹毒方面獲得了很大的成績。研究了病原體的抵抗力(П. Н. 安德烈也夫、維舍列斯基、Г. А. 格盧霍夫策夫、В. К. 舒什科和 П. Т. 克臘韋次),病原體在自然界的分佈(З. М. 伊林娜、Н. Г. 奧耳蘇費也夫、Е. М. 次韋特科娃、В. Т. 科托夫、И. И. 羅扎諾夫、П. П. 斯節派金等),豬丹毒的流行病學(П. С. 索洛姆金、М. Д. 波奇科等),制定出血清學和變態反應診斷法(索洛姆金、羅扎諾夫、Г. В. 茹可夫、В. Ф. 彼得羅夫)。在革命前的俄國用來預防豬丹毒總共只有 Д. Ф. 康涅夫所研究出的一種疫苗。在蘇維埃政權的年代裏提出了一系列的生物製品以便進行抗豬丹毒的主動免疫注射:穆拉姆采夫的半固體蟻酸疫苗,格盧霍夫策夫的氫氧化鋁蟻酸疫苗,П. П. 察烈格臘德斯基的全蘇實驗獸醫研究所活菌無毒疫苗,德涅泊爾彼得羅夫斯克生物製品廠所改善的豬丹毒沉澱疫苗(В. П. 美爾庫洛娃和 А. Б. 厄朴什切依娜),А. Ф. 波波夫等人研究出的活菌無毒疫苗。

蘇聯的學者們幾乎研究了有關豬瘟的全部基本的問題:研究了病原體主要的生物學特性(索洛姆金、Д. А. 促韋爾卡洛夫、Г. Ф. 波果尼亞依洛、А. И. 拉克齊奧諾娃、Б. С. 海特、庫圖科娃等),研究了對於某些種系豬的豬瘟的敏感性(П. Е. 拉丹、А. С. 列斯

基、B. И. 斯道里尼柯夫),研究了臨床學、病理學(П. Н. 安德列耶夫、Н. Ф. 別里柯夫、Б. К. 保里、Б. П. 弗謝沃羅道夫、А. И. 加弗里羅夫、В. З. 切爾尼亞克等),研究了診斷學(П. Н. 安德列耶夫、А. А. 邦里柯夫、М. Н. 維列舍金、Н. А. 那烏莫夫、М. Г. 柯沙列夫、庫切連柯、Д. А. 促維爾卡羅夫等),研究了一般性和特異性的預防措施(П. Н. 安德列耶夫、М. Н. 別拉甫策夫、М. Н. 維列舍金、В. П. 格洛莫夫、В. Т. 柯道夫、И. И. 庫列斯科、Г. М. 曼諾夫、А. П. 烏朗諾夫等)。

蘇聯學者在研究與預防幼畜傳染病方面,也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在 1937 年帕雷科夫斯基提出了蟻醛疫苗,而在 1938 年研究出防治羔羊痢疾的高度免疫血清; А. А. 沃耳科娃、С. Д. 莫羅左夫和 Р. С. 米寧娜研究並提出了防治羔羊痢疾和肺炎的二價血清。在 1934 年 С. В. 莫爾多又和在 1936 年羅斯托夫以及 А. Ф. 波波夫獲得了防治仔豬副傷寒的抗菌以及抗毒素血清,在 1949 年 М. М. 依萬諾夫提出了預防仔豬副傷寒的蟻醛疫苗。

在 1956 年 Б. Ф. 別斯薩拉博夫研究出用生霉素(Биомицин)治療仔豬副傷寒,並獲得良好的效果。

蘇聯的學者在犢牛大腸桿菌病,副傷寒和雙球菌性敗血症的特異性預防以及治療方面進行了很有價值的研究。蘇聯的學者們阿姆菲恰特羅夫、М. И. 艾扎土洛夫、阿里卡耶夫、阿爾漢格爾斯基、維什涅夫斯基、維舍列斯基、Ю. И. 依萬諾夫、А. Г. 馬利亞文、米欣、戚昂、К. П. 切普羅夫等全面地研究了這些傳染病以及制定出有效的預防和消滅這些傳染病的措施。

在 1932 年維舍列斯基、Г. П. 貝奇科夫以及杜博維克提出了預防犢牛傷寒的肉湯蟻醛疫苗。米欣也提出了同樣的蟻醛疫苗,同時還有防治犢牛副傷寒的血清。近來又提出了比較完善的抗犢牛副傷寒疫苗:蟻醛明礬疫苗和氫氧化鋁蟻醛疫苗(阿爾漢格爾斯基及其同事們,1953)。

蘇聯學者 И. Ф. 克委西塔捷、穆羅姆采夫、舍爾斯托博耶夫等研究出犢牛大腸桿菌病和副傷寒的噬菌體療法以及噬菌體預防。

在 1953 年 П. В. 彼羅娃提出了治療和預防犢牛大腸桿菌病以及副傷寒用的嗜酸菌的肉湯培養物(АБК)。

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後的四十年來,我國學者們研究了許多新的或很少有人研究過的傳染病,如:李氏桿菌病(安德列耶夫、Е. И. 古德柯娃、道洛費也夫、П. П. 沙哈洛夫、П. М. 斯文錯夫、Т. П. 斯拉保斯彼次斯基、В. В. 斯里夫柯、Н. Г. 特列古保娃等),土拉倫斯病(А. А. 沃里費爾茨和 М. М. 沃朗柯娃、Н. А. 加依斯基、道洛費也夫、М. П. 波克洛夫斯卡婭、Г. Я. 辛那依、П. В. 索莫夫和 Е. В. 波克洛夫斯卡婭、Л. М. 哈謙涅維爾等)、山羊傳染性胸膜肺炎(С. Н. 安那斯塔斯揚、杜卡洛夫、Ф. Д. 魯卡申柯、Е. В. 基謝列夫、Н. Г. 康迪尤林、Р. С. 波耳柯夫尼柯娃、斯米爾諾夫、Е. Ф. 費杜羅娃等),鉤端螺旋體病(А. А. 阿夫洛洛夫、安德列也夫、А. А. 瓦爾佛羅美也娃、М. В. 捷姆斯柯夫、С. Я. 留巴申柯、М. А. 穆沙也夫、Л. С. 諾維柯娃 В. И. (傑爾斯基赫等)馬穗狀葡萄菌毒病(К. И. 維爾欽斯基、В. Г. 德洛保奇柯、П. П. 道勃累金、Н. А. 納烏莫夫、Н. М. 彼道卜里奇卡、М. И. 沙里柯夫、А. Ф. 沙爾基索夫等),許多禽類的傳染病(С. И. 阿岡波夫、М. А. 阿爾切米傑夫、И. А. 阿爾丘赫、И. Н. 道洛什柯、И. С. 扎卡也夫斯

基、A. П. 基烏爾-穆拉托夫、A. B. 考朗內、斯文錯夫、П. B. 西佐夫、П. M. 索彼柯夫、B. H. 秀林等),狗和皮毛獸的傳染病(Н. A. 德列米亞茨基、基烏爾-穆拉托夫、C. C. 柯道夫、Н. П. 奧爾羅夫、B. A. 波卜柯夫、Г. Л. 拉德基維羅夫斯基、E. C. 切爾卡斯基等)等等。如果說在廿世紀初舊俄時代已經瞭解了將近三十種家畜和禽類的傳染病的話,那末,目前蘇聯動物流行病學者則已經對六十多種不同的動物和禽類的傳染病進行了研究。

除了在研究家畜和禽類的傳染病方面以及製定防止這些傳染病的措施方面有着許多科學發現和成績以外,在動物流行病學各論方面也出版了大量的科學著作和教科書,如:“動物流行病學各論”(1954,維舍列斯基主編)、“動物傳染病”(1956 A. Л. 斯柯莫洛霍夫)、農畜厭氣菌傳染病”(1954, Я. Р. 柯瓦連柯)、“馬的傳染病和侵襲病”(1954, B. M. 列卡列夫主編)、“牛的傳染病和侵襲病(1956)”和“綿羊和山羊的傳染病和侵襲病”(1951 Ф. A. 特連奇也夫和 A. A. 馬爾柯夫主編)、“豬傳染性疾病”(1954, 安德列也夫)、“禽類疾病”(1951, 斯文錯夫和 A. A. 烏沙柯夫主編)“皮毛獸的疾病”(1952, С. Я. 柳巴申科)、“病毒學和農畜病毒性疾病”(1956, M. B. 列沃)、“犢牛最主要的傳染病”(1951, И. И. 阿爾汗蓋里斯基)、“牛的結核性腸炎”(1941, И. И. 維什涅夫斯基)、“動物的土拉倫斯病”(1951, K. A. 道洛費耶夫)、“馬的傳染性貧血”(1940, Я. Е. 柯里亞柯夫)、“動物的鉤端螺旋體病”(1948, С. Я. 柳巴申柯)、“流行性淋巴管炎”(1953, И. В. 奧孔錯夫)、“羔羊厭氣菌性痢疾”(1952, M. Д. 波雷柯夫斯基)、“口蹄疫”(1952, A. Л. 斯柯莫洛霍夫)、“禽痘”(1954, B. H. 修琳)、“鼻疽”(1947, H. E. 次韋特柯夫和 B. З. 切爾厄亞克)、“農畜的蒲氏桿菌病”(1952, M. K. 尤斯柯維茨)、“農畜的結核病”(1953, M. K. 尤斯柯維茨)以及其他等等文獻。

蘇聯學者們在獸醫消毒學方面也完成了巨大的工作。找到了許多有效的消毒製劑、並應用於獸醫實踐中,製訂了許多被感染的對象(禽舍、土壤、皮革原料等)的無害處理的方法(當發生單發的傳染病時),研究此項工作的有:П. К. 保雅爾施諾夫、С. И. 郭爾日柯夫斯卡婭、А. И. 葉沃洛夫、Н. М. 柯馬洛夫、И. П. 柯爾涅也夫、拉克齊奧諾夫、Н. М. 諾斯柯夫、Я. Л. 奧庫涅夫斯基、А. А. 波里亞柯夫、Б. И. 魯達柯夫、П. А. 索舍斯特文斯基等等。С. И. 郭爾日柯夫斯基、Н. М. 柯馬洛夫、波里亞柯夫、B. С. 雅爾內赫等提出了機械消毒法和流動消毒裝置。

在動物傳染病的特異性預防、治療和診斷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舊俄時代動物流行病學家總共只擁有十三種生物製劑(疫苗、血清和診斷劑),目前在蘇聯已經能製造出八十幾種生物製劑了。因此,目前的生物製劑的數量比舊俄時代增加六倍多。

蘇聯流行病學者創立了動物流行病學總論,這是值得引以自豪的。維列沙金、M. C. 甘奴什金、柯瓦連柯、柯梁柯夫、斯柯莫洛霍夫等學者對於研究動物流行病學總論的理論性原理方面進行了特別有成效的工作。

蘇聯動物流行病學者們創立了關於傳染和免疫學說的原理,研究了病理發生、診斷、治療等問題,闡明了動物傳染病發生、散播和停熄的基本規律性,並在這些基礎上提出了預防和消滅這些傳染病的有效方法。

在動物流行病學總論的原理方面出版了許多科學文著和教科書,如:“動物流行病學

總論”(1654, 甘努什金), “獸醫學中生物製劑和化學製劑的應用”(1654, 柯瓦連柯)、“動物傳染病的預防和消滅”(1951, 斯柯莫洛霍夫等)、“微生物的變異性及免疫問題”(1953, C. H. 穆洛姆采夫)以及其他等等。

今天, 黨和政府在蘇聯動物流行病學家和獸醫實際工作者的面前提出了如下任務:  
a)在最短期間內保證消滅綿羊痘、豬瘟、口蹄疫、鷄瘟; b)在最近2—3年內完全消滅國內的馬流行性淋巴管炎; b)在1957—1960年內達到:使一切有蒲氏桿菌病以及動物其他傳染病的國家種畜繁育工作站和育種國營農場完全得到康復; 使有羊蒲氏桿菌病和牛結核病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完全得到康復。

和國營農場與集體農莊的勞動人民一樣, 蘇聯的動物流行病學家們積極地響應了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開展全民運動的號召——使肉類、油類和牛乳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量趕上美國。

毫無疑問, 我國的學者們一定會成功地利用四十年來所積累的經驗, 光榮地完成這一切任務, 為共產主義建設事業作出有價值的貢獻。

(郭玉璞, 劉敏雄譯)